

# 文具国标为何遭遇“执行难”?

亦钧

## 今日论语

你家孩子会啃橡皮和铅笔吗?日前,江苏省质监局连续发布了对多种文具用品的监督检查和风险监控质量分析报告,笔芯液、修正液、橡皮、作业本等均有部分检测出有毒有害物质超标。

文具用品终日与孩子亲密接触,文具用品的安全底线大范围失守,这是将孩子置于一种危险境地。孩子为何会成为劣质文具用品的潜在受害者?标准欠缺是重要原因:一般国内文具参考的国内标准是“GB21027-2007”的《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其中给出了铅、汞、砷等8种重金属元素的迁移限

量,却未对文具中邻苯二甲酸酯、甲苯、乙苯、二甲苯等指标作出要求,也没有对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作出要求。这个国家标准从2008年开始实施,如今已有数年,随着现实的发展变化,增补完善相应的国家标准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实中钻国家标准空子的“毒文具”只是少数,更多的是国家标准在实践中遭遇“执行难”。《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对书包的甲醛含量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前不久,有媒体在超市、小商品市场及购物网站购买了数款不同价位的书包,经检测发现这些书包游离甲醛均不同程度超标。虽然只是一次抽样调查,但也不乏反意义——太多

色彩艳丽、款式新颖的书包,一经打开就立刻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它们真的安全吗?在生产流通销售的各个环节,是否层层把关,是否按照国家标准进行了严格检查?《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制定之初,已尽可能详尽地作出规范,其中不乏“圆珠笔帽的要求”、“手工剪刀的形状”等细致入微的规定,但无论多么详尽的标准都不免随着市场发展变化出现疏漏,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标准得不到严格执行,即使标准本身万无一失,也不过是徒具象征意义。

文具用品国家标准为何遭遇“执行难”?表面看是因为监管部门之间分工不明、权责不清,因此形成了监管漏洞;更深一层探究,

在多头管理体系中,相关部门往往在“抓大放小”,结果是大事“齐抓”、小事“共不管”,而文具用品恰恰是这样容易被忽略的“小事”——价格相对低廉,市场规模较小。在有些学校的周边,从有毒的文具到有有毒的小食品,早已养痍成患。造成这种乱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监管部门“抓大放小”未尝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不应只是一句口号,从维护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涉及未成年人的商品理应得到最严格的规范和最有力的监管,不断完善强制性标准之余,强化日常监督管理显然更为重要,第一步不妨从改变“抓大放小”的监管思路做起。

## 新民随笔

### 人类

董纯蕾

被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公布的消息刷屏那晚,我正在读一本名叫《人类简史》的热门书。一时深陷于盘根错节的人类进化树中,便越发觉得二不二孩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不都是过日子嘛,各过各的呗。然而,很快,“二孩之好”便似成了人生的“优秀基因”,即便有众多“可二不二”之人,也须得承认是吃不起“二”要承担的种种苦。

顺便说一句,读这本书是因为最近写了篇关于人类起源研究的新闻;朋友凑巧也在看同一本书,不过她是奔着扎克伯格的推荐书单去的。你瞧,即使干着同一件事,人和人还完全不同呢。

我的采访告诉我,人类的起源、演化和迁徙这些事儿,比我以为的复杂得多得多。人类对自身的了解,也比我们以为的浅陋得多得多。

你知道北京猿人并不是我们的老祖宗吗?直立人很可能未能演化成现代人,而走上了另一条通往灭绝的分岔路(请允许我加上“很可能”之类的限定词,来表达一个文科生对自然科学的不确定性的无比尊重,以免班门之前弄错了斧)。你听说过尼安德特人吗?这也是一个被认为早已灭绝的人种,然而有新证据表明,现代人的DNA序列中有1%至4%与尼安德特人非常相似,也就是说,不同演化阶段的人类曾经共存于这个地球上,甚至发生过“混血”。

现代人总抱怨缺觉,总以为现代化生活“压力山大”,电子产品无孔不入,睡眠时间大不如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睡眠模式研究报告说,生活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成年狩猎采集者并不比生活在工业化国家的人睡得更少:前者每晚平均睡眠时间也不过6.9至8.5小时,而且身体健康、不觉得睡眠不足。看吧,对于口声声挂在嘴边的“人类”,我们知道的,其实少之又少。

对人之群体尚且知之甚少,何况每一个个体?真别以为你有多了解人,有多了解别人,很多情况下,你的经验仅仅是你的经验而已。一个娃还是两个娃的家庭,甚至丁克,甚至独生子女主义,都是过日子,都有好日子可过。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尚能相安无事,何况其他?“有对象了没”的问候语是多少大龄单身女青年的梦魇,但愿“二孩了没”不会步其后尘。

# 关爱留守儿童应该“去标签化”

## 日报观点

多年来,“留守儿童”一直是频现报端的热词。作为一名在农村地区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我对“留守儿童”这个词的感受比较复杂——一方面,这个词的确很直观地描述了我们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易于传播;另一方面,这个词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刺眼的标签。

很多人在谈到农村孩子时,都会突出他们的“留守儿童”身份。在很多媒体报道中,农村儿童的形象都有一些负面,甚至在一部分人眼里,“留守儿童”几乎已等同于“问题儿童”。这种倾向让我深感忧虑,有意无意地把那些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当作“问题人群”,并不利于农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坦率地说,有“问题意识”不是坏事,正是因为有社会各界的关注,农村的留守问题才得到了一些解决。但我担心的是,一旦“留守儿童”被当作“问题儿童”的近义词,有些人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农村孩子,或避之不及,或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事实上,媒体报道的一些与农村孩子有关的“负面”新闻,都有非常具体的原因,应该就事论事地对个案进行分析,而不是将所有农村孩子视为一个群体。

我接触到的很多孩子,都不乐意别人说他们是“留守儿童”。有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听到别人说我是‘留守儿童’,心里就觉得好像爸妈不要自己了一样,特别难受。”如果媒体不断强化“留守儿童”这一身份标签,会让那些暂时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的

孩子,在同龄人中被“隔离”出来。我知道,即使不用“留守儿童”这个标签,农村学生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客观存在。但是,撕掉这个标签,至少能让那些农村孩子感受到更多的平等。(马长军 刊今日新华社每日电讯 本报有删节)



“蛇吞象”

西安雁塔区丈八街道东滩社区原主任于凡涉嫌违纪违法、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于凡把持社区大小事务,以土地开发权为筹码,向开发商提出“进贡”要求,谁同意就给谁。他单笔受贿5000万元、涉案总金额高达1.2亿元,成为“小官巨腐”的典型之一。徐骏画

## 自由谭

日前,G672次高铁上发生的一幕,至今让无数人感到温暖。乘客李翔坐在15号车厢的椅子上,等待进入郑州东站,突然感到胸口有些发闷。面对丈夫突然的变化,妻子抱着孩子不知所措,慌乱地寻找列车员寻求帮助。后在一位老人的救助下,李翔被送到医院救治,转危为安,而老人悄悄地离开了医院。

这位老人的名字叫胡大一。但凡对心血管科有点了解的人,恐怕都知道胡大一这个大名,在医疗界他确是“大神”级人物,是我国享有盛誉的心血管病专家之一。有心人也发现,胡大一的母亲胡佩兰,98岁的良心医生,曾当选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当时的颁奖词说:“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你是仁医,是济世良药。”这话用在胡大一身上,也较准确。

# 从胡大一救人说起

王石川

有网友说李翔“攒了多少人品”,才如此幸运。“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大医不只是医术高,更在于医德高。生于1946年的胡大一,已近古稀之年,为救李翔可谓不辞辛苦。不仅诊,还治;不仅跑前跑后,还忙着联系医院。从报道可知,胡大一先是诊断李翔的病,让李翔服药后,又让人与河南省人民医院迅速联系,当李翔被推进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胡大一将病人亲手交给了他的学生高传玉,并一起制定好抢救方案。当李翔的心率逐渐稳定,血压和心跳都开始

恢复正常,一切安当时,他才悄悄离开。这种专业水平和精神高度,无法不令人肃然起敬。

还有一些温馨细节。比如,列车员开始通过广播向乘客寻求医疗援助后,迅速赶到的除了胡大一,还有一位年轻人。再比如当李翔需要药物时,前排一位乘客掏出了速效救心丸。胡大一接到手心中,下意识地数了一下:30粒。继续挖掘,救人佳话中仍有新鲜元素。比如,从报道配图看,被抢救者李翔身着的服装上印有中国国旗和狮子会标志:“LIONS”。国际狮子会是世界最大的服务组织,会员分布于世界209个国家。入会者必须

具有资格:在社会上具有良好的名声,及具有良好品格等等。我国2002年批准成立分会,它是由政府批准的第一家在大陆设立的国际性服务性社团。从后续报道可知,李翔果真任职于中国狮子会北京圆梦服务队。

近年来,狮子会扶助救人事件比比皆是。知情人透露:“我和李翔一起参加过多次公益服务,他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大爱的人,非常乐于助人、乐于奉献。”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李翔热衷于社会服务,在危急关头他同样受到了救援,这是多么让人赏心悦目的事情。这则高铁佳话的背后,或许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细节,共同拼接了完美的故事。救人,不一定图回报,但是多做善事,必然能获得心灵上的满足,为我们所在的社会带来美好。

## 新民新语

### 自行车保卫战

左妍

前两天出门办急事,扬招出租车不停,用软件无人接单。我从家里推出一辆自行车,刚上路,心里就忐忑不安。马路上没有非机动车道,尽管两侧人行道很宽,也划了各种线,但靠内一侧被商铺占据,靠外一侧停满机动车。自行车究竟该往哪里骑呢?

我的一个同事,家离报社只有几公里,周边马路环境优美,在这沉静的秋日,骑车一定是非常舒服的体验,可惜他研究了许久,都没找到连贯的“允许骑车的线路”,只能作罢。

我国曾被称为“自行车王国”,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职工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有的大厂职工好几万,光厂里的自行车棚就有十多个。每天上下班时近万辆自行车进进出出,非常壮观。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1972年纪录片《中国》里也有一个经典片段: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掠过天安门广场,清脆的车铃声悠长回荡……

但这种场面已不复存在了。公交系统快速发展,私家车保有量迅速增长,马路越来越宽,自行车道却越来越窄。自行车不仅要为机动车让路,还要忍受尖锐的喇叭声和司机的训斥。我时常接到读者来电,或抱怨或投诉:“3米宽的非机动车道,划上了停车位,就留几十厘米给你骑车。”“好端端的自行车道,不是停了车就是摆了摊。”

看来,并不是现在的人不骑自行车了,而是我们的城市没有为自行车留下足够空间。挤车累,开车堵,打车难,自行车没路骑,这就是我国不少城市面临的尴尬。而一些发达国家,对自行车的友好程度却超过我们。有报道说,哥本哈根三分之一的人骑车上下班,政府从现有的机动车道中辟一根作为自行车道;荷兰全境有40000公里自行车道,是高速公路长度的近10倍。

骑车,对个人和城市都有很多好处,它把人们从住宅、汽车、办公室这些“盒子”般的密闭空间中解放出来,去感受世界。我们提倡低碳生活,但这必须有实际的基础设施支持。真希望城市规划能为自行车留下一席之地,让自行车能够重新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城市也会随之改变。